

价值理念的重塑与廉政文化建设

张兴国, 张兴祥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价值理念的错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 因此价值理念纠偏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 也是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价值理念纠偏存在较大的难度。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重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理念, 需要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 充分发挥廉政建设的文化功能。

[关键词] 价值理念; 重塑; 廉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684(2007)01-0058-04

自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以来, 研究政治腐败及其防治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分析了腐败产生的社会机理。20世纪60年代后期, 国外一些学者开始从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阐释腐败的缘起。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 他认为腐败在社会不同发展时期有高低之分, 其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 在大多数文化区域中, 腐败在现代化最剧烈的阶段更为盛行; 导致腐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发生变化, 现代准则与传统准则的冲突导致社会失范。^{[1](P58, P60)} 由于不存在其合法性得到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 一切都受到怀疑, 这种冲突导致的真空, 使个人的行为既不必遵循现代准则, 又可不受制于传统准则。^[2] 也就是说, 价值理念的错乱为那些企图钻空子的公共行政人员提供机会, 他们将根据个人的偏好选择价值取向, 而这种价值取向实际上已背离了基本的道德规范, 一旦蔚为风气, 就会形成“腐败文化”或“贪渎文化”。

一、价值理念错乱: 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

如果说腐败是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公共行政机构官僚化所形成的亚文化现象, 那么, 制度本身就

提供了这种亚文化的生成机制。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阿克顿勋爵关于“权力趋向于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著名论断中找到答案。即使是制度的嬗变更新, 也无法避免权力异化的命运, 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根除腐败。列宁早就指出: “旧社会灭亡的时候, 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3](P380)} 十月革命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沙皇专制政权的性质, 但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一下子销声匿迹的, 它还会长期存在并继续侵蚀新生的社会机体, 使其慢慢腐化。对此, 列宁有清醒的认识, 他曾警告说, “在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 “一切措施都会落空”。^{[4](P200)} 不错, 当腐朽没落的价值理念在人的意识形态里重新复活时, 贪污受贿之风就会盛行, “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 另一方面使社会惩罚失去了效力。^{[5](P125)}

从社会文化的视域看, “腐败文化”有其历史传承性, 这不仅是传统的惰性, 更是现代公共行政难以突破的伦理困境。我国有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加上长达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自有其潜藏和繁殖的深厚土壤, 一俟条件成熟, 就会卷土重来。我们不妨回味

[收稿日期] 2006-12-20

[作者简介] 张兴国(1948-), 男, 福建长乐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副教授;

张兴祥(1969-), 男, 福建惠安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下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显示其‘永生’。”^[16](P129) 时至今日，封建官僚意识形态非但没有绝迹，相反地，仍有局部复活的迹象。例如，封建权力私有观念（专制独裁、以权谋私、升官发财、卖官鬻爵）、封建宗法观念（裙带关系、封妻荫子、任人唯亲、人身依附）以及封建官僚主义（思想僵化、高高在上、不讲效率、玩忽职守、互相推诿、徇私行贿）等等，可以说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里深深扎下了根。不仅如此，封建官僚意识形态还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渗透结合，形成一种‘合资混合’的杂交怪胎。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必然会乘虚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等现象。”^[17](P167) 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时期，交换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基础，经济利益越来越突出，以经济为目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使传统（“大一统”）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失去了原有的支撑点，陷入一种多重化的极不稳定的状态。^[18] 多元化意味着不存在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行为主体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准则。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以权谋利、以钱开路、行贿受贿的腐败之风就会愈演愈烈，形成一种极为普遍的腐败社会心理。如果从思想上找根源，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导致腐败最直接的原因正是腐败主体道德观、价值观的迷失。腐败分子既不向往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圣崇高的伦理精神，也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而是把二者的糟粕视为圭臬。

价值理念是人们行为准则的指南，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问题，特别是价值理念的错乱问题，其次才是制度或体制问题，那种认为廉政制度建设优于廉政观念建设的论点是不足为训的。没有正确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制度反腐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毕竟，制度要靠人去执行，人的脑子歪了，再好的制度执行起来也会走样，甚至形同虚设。1952年，美国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就说过：“我认为改进机构更为

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更为深刻的道德价值观……我们看到的政府的失误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失误的反映。所有这些可能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不仅要帮助改革政府，而且还要帮助改革我们自己。”^[19](P221-222)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课题。

二、价值理念纠偏：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价值理念纠偏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也是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因为价值理念一旦错乱，其后患可想而知。它不仅导致从政道德严重缺失，而且导致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均荡然无存——当政治生态危机扩展为整个社会的生态危机之时，一个国家焉有宁日可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而官邪由于思想乖离也。无数的事例表明，贪官的腐败几乎都是思想蜕变开始的，从其精神支柱倾斜开始的，如中国古语所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不从思想意识上彻底铲除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念，不从根基上摧毁腐败行为背后的腐朽文化的支撑，反腐败工作就与“割韭菜”无异：旧的腐败分子还没有铲除干净，新的腐败分子又冒了出来，前“腐”后继，不绝如缕。

然而，价值理念纠偏并非易事。首先，从哲学范畴上说，价值理念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如风行水上，看似有踪，实则无形。与有章可循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相比，它更不易捉摸，更难掌控。要使正确的价值理念内化于心，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铸“魂”工程，标本兼治，才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其次，价值理念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0](P666) 归根结底，价值理念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教育水平相适应的文化现象。以什么样的价值准则来要求领导干部遵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亨廷顿认为：“要减少腐败，一方面要把官员行为规范标准降低到恰当程度，另一方面需要使官员行为有所改善，以适应这些规范。”^[11](P63) 过于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执行起来难度大，结果肯定于事无补。再者，社会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又具有惰性，在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中，价值理念往往与现实脱节，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这在社会转型

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和国家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反腐斗争也取得显著成效,但腐败的总体规模仍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历史经验表明,当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最迅速时期,也是产生腐败的高发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政治结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一系列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也随之变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我国的腐败现象也进入高发期和多发期,形势非常严峻,主要表现为:(1)经济违法案件上升,金额越来越大;(2)领导违法案件增多,发案层次升高;(3)顶风作案现象严重,新发案突出;(4)团伙、群体作案,窝案、串案增多;(5)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富了“和尚”穷了“庙”;(6)腐败分子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腐败行为向新的领域拓展;(7)由经济领域向司法、领导机关蔓延,由沿海地区向边远地区辐射;(8)道德败坏案件大幅度上升,权色交易突出。^{[11](P202-206)}

当然,社会思潮的涌动与流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人的意识形态产生冲击,这也加大了价值理念纠偏的难度。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生活方式等源源不断地涌入,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一些领导干部局限于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认识,加上受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均产生怀疑,这是他们理想信念开始淡化、动摇的外因。与此相伴随,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就涌动着这样一股思想浊流,认为腐败有利于社会转轨,腐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在各种浊流的冲击下,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削弱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竟成了不少腐败分子的“座右铭”。如贪污受贿100万元,挪用公款600多万元进行私人营利活动的北京中建一局公司项目经理部原经理罗汉斌,交待作案目的时说,他是“为了钱,为了捞更多的钱”。侵吞公款100万元的黑龙江省哈尔滨河图支行的杨立斌说:“现在社会谁不为钱,我贪污钱并不寒碜,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随着贪欲的膨胀,数百万元的金额已很难填满腐败分子的胃口,近些年清查出来的大案要案,动辄上千万甚至数亿元,简单是天文数字。

可以说,不能自觉加强政治道德认知,不能自觉践履政治道德规范,不能自觉提升政治道德境界,是一些领导干部滑向腐败泥淖的主因。因此,廉政文化建设首先应正本清源,破立结合。所谓“破”,就是破除腐朽落后的价值观,使其无立锥之地;所谓“立”,就是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现代价值体系,在领导干部中倡导公正、民主、法治、责任和效能最大化等价值理念。当前,应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育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廉政精神和廉政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引导领导干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确立正确的政治道德意识、确立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核心,强烈的政治道德责任、高尚的政治道德情操为保证的政治道德追求目标。^{[12](P26-27)}

三、价值理念重塑:廉政文化建设应创新教育模式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反腐败工作思路。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它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是反腐倡廉的固本之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重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理念,非通过教育途径不可。只有加强教育,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培育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的社会风尚,才能真正营造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执政为民的文化氛围,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

应该说,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教育工作没有一以贯之,经常出现停滞、中断。新中国建立初期,因为面对恢复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一些部门的领导往往只注意抓经济工作,忽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于是,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才有1951年末至

195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又开展了新“三反”斗争。不过,1957年整风运动搁浅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廉政建设步入误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工作近乎瘫痪,这为后来腐败现象的泛滥埋下祸根。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思路,思想工作相对削弱了。邓小平同志曾严肃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3](P230)}

反思过去我们的思想教育,的确存在许多缺陷。一是教育目标过于理想化、原则化、绝对化、抽象化,缺乏现实性、指导性、约束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以共产主义那一套高、大、全的道德标准来要求领导干部遵循,就会不切实际,令人望而却步,结果适得其反。应该根据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变化,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倡导具有时代气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道德原则和规范。二是教育内容空泛,那些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东西,常常流于说教,即使入耳入脑,也难以“内化于心”。不仅如此,在实际宣教工作中,常以政治法律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立德滞后,执德不严,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三是教育形式陈旧、僵化,大多采取填鸭式、满堂灌的方式,枯燥无味,缺乏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很难引人入胜,深入人心。另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功利色彩较强,存在“一阵风”现象,不能持之以恒,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重塑价值理念,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笔者以为,香港和新加坡在廉政教育上颇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这里不妨援引两个例子。香港廉署社区关系处制作了许多电视片、广告片,宣传肃贪倡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有关的宣传画和条幅。每到节日,公务人员都可能收到一个笔记本或电话簿,上面印发了《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同时注明接受利益的有关提示:如亲人的范畴和送礼的标准,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礼尚往来的标准,一般同事间礼尚往来的标准。超过规定标准,须向特首“申报利益”。新加坡也在廉政教育上动脑筋,有一组名叫《对贪污贿赂说“不”》的宣传画,富有人情味。第一幅画了一杯酒,酒杯底下有一个手铐,同时注明“这

杯酒不知道会把你领到什么地方”。第二幅画了7种洗涤用的物品,如水、汽油、洗涤剂、刷子等,同时注明“用什么都不会把这个污点彻底洗掉”。第三幅是一个赌盘,上面刻有家庭、事业、工作、孩子等,同时注明“你用哪个去做贪污的赌注?”^[14]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都注意运用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市民和政府官员进行入情入理的教育,寓乐于教,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富有时代气息的道德规范融入廉政文化之中,同时用先进的价值理念去教育、引导、影响领导干部,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使他们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增强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创新教育模式,就是充分发挥廉政建设的文化功能,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价值理念看起来是个无形的东西,但其作用和影响可能更为广泛、更为持久,一旦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将起到法律制度不能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2] K·吉利斯皮,G·奥克鲁利克.政治腐败与反腐败:研究评价[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1994,(4).
- [3]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 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 [6] 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4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 [7]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8] 黄明哲.廉政文化建设论纲[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6).
- [9] 刘明波.廉政思想与理论——中外名家论廉政与反腐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 [11] 罗忠敏.通向廉政之路——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思考与现实对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 [12] 刘秀芬.政德实现论——领导干部政治道德失范及对策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 杨伟.香港和新加坡廉政教育的几个特点[J].中国监察,2005,(7).

(责任编辑:邓 辉)